



古代传记文学史稿

姜涛 赵华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司马迁及其传记文学	9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著作	9
第二节 司马迁的历史观	13
第三节 《史记》列传的分类	23
第四节 《史记》传记的思想内容	28
第五节 司马迁评价人物的态度	38
第六节 《史记》传记的真实性	46
一、考信六艺，不妄为说	46
二、考信史籍，不离古文	48
三、语焉不经，文不雅训则不取	49
四、疑则传疑，疑者阙焉	52
五、网罗旧闻，匡谬纠偏	54
第七节 《史记》传记的写作艺术	59
一、精于剪裁，严于取舍	60
二、论考行事，不载空言	65
三、观其行事，不录著述	70
四、主次分明，详略得体	73
五、描写场面，刻画人物	77
六、衬托对比，刻画人物	85
七、独白旁议，刻画人物	89
八、通过对话，刻画人物	93
九、描写细节，刻画人物	98

十、言近旨远，辞浅意深.....	103
第八节 《史记》传记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114
第三章 其他正史中的人物传记.....	117
第一节 班固《汉书》及其人物传记	118
第二节 范曄《后汉书》及其人物传记	124
第三节 陈寿《三国志》及其人物传记	131
第四章 通行人物传记	141
第一节 别 传.....	141
第二节 别传的特点	167
第三节 自传及其特点	173
第五章 行状、碑志与诔文	187
第一节 行 状.....	187
第二节 碑 志.....	194
第三节 诔 文.....	204
第六章 真人真事之外的传记	209
后 记.....	218

第一章 绪 论

传记文学，同其他样式的文学一样，在我国古代文学中有它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它为我国光辉灿烂、丰富多采的古代文学宝库增添了光彩，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古代文学遗产。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是中国的脊梁。”这些脊梁的高尚品德、优良作风、精神风采，以及诸种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也往往保存在他们的传记之中。因而学习、研究古代传记文学，了解它的基本面貌，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人物品格上能汲取有益滋养，而且在写作艺术上对我们写人物传记、人物通讯，乃至报告文学之类的文章，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传记，古称之为“传”，它是特指以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章，所以又称人物传记。一篇写得好的人物传记，又往往带有某些文学色彩，因而又称传记文学。

传之名，渊源颇远，早在春秋时期就屡屡出现。但最初所称之传，只用于解经，而不用于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受于后。”这就是从最初的意义上来解释传的。诸如《春秋内传》、《春秋外传》、《公羊传》、《谷梁传》等书之传，就都是转述、解释的意思。这种意义上的传，一直沿用到后世。宋朱熹为《诗经》作注，称之为《诗集传》。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传记》篇

里说：“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按：指《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刘勰所说的“转受经旨”的传，章学诚所说的“附经而行”的传，都是指训释、注解儒家所谓经典的文字。它与我们所说的以记述人物生平事迹为中心的人物传记，毫无共同之点，这是必须严加分辨的。

以记人物生平事迹为中心的人物传记，比较晚出，一般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这是不错的。但从司马迁创为列传后，传记文学在体制和形式上，却又有所发展。从立传的作者和立传的对象来看，我国古代传记大抵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史传，一是通行传记。所谓史传，是指史官所写的，编入正史中的人物传记，一部二十四史中的人物传记，即属此类。所谓通行传记，是指一般文人士大夫所写的，未载入史册的一般人物传记，它既包括别传，也包括自传。清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里说：“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指刘大櫆）云：‘古之为达官贵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圻者（指韩愈的《圻者王承福传》）、种树（指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而已。’”他把传记分为史传和通行传记两类，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也有人反对这一说法。如章学诚就是如此。他在《文史通义·传记》篇里说：“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史官矣。”他只是就通行传记一端去立论，而没有从传记发展的实际去考察，自有其片面和偏颇处。事实上，在古代，特别是自秦汉以后的整个封建时代，由于等级森严，贵贱有别，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立传，一般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立传的。而为达官贵人立传，又不是尽人可为的，必须“史官职之”，是通过史官来实现的，一般文人士大夫是不能越俎代庖，随便为某人立

传的。就史官来说，历代均设有史官，他们在撰写历史的同时，就是专门为帝王将相、达官显宦立传的，以备编入正史。这种情况，始于《史记》，终于《清史稿》，概无例外，贯穿整个封建时代，这是无可驳辩的事实。至于“尽人可为”的通行传记，那是唐宋以后的事。明吴讷在《文章辨体·传》类序中说：“太史公创《史记》列传，盖以载一人之事，而为体亦多不同。迨有前后两《汉书》、三国、晋、唐诸史，则第相祖述而已。厥后世之学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虑其湮没弗白，或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法戒者，因为立传，以垂后世。”这就清楚雄辩地说明史官为达官贵人立传行于前，文人学士为一般人立传起于后，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史官为人立传，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在司马迁以前，史书虽然很多，但除了那些早已亡佚者外，流存至今的一些史书，从体制上说，不是记言，便是记事。偏重于记言的，如《尚书》、《国语》、《战国策》；偏重于记事的，如《春秋》、《左传》；不曾有一部史书是专门记人的。虽则如此，但在记言、记事中，也偶有记人的段落。这里不妨以《左传》、《国语》、《战国策》三书各举一例，以见其面目：

《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所记《晋公子重耳之亡》，就是以晋公子重耳为中心进行记事的。文中先叙写他周游各国的具体情况，次写他返国即位的经过，最后写他即位后采取种种措施以安定内部，巩固政权。相当完整地记叙了晋公子重耳从出亡到返国后所作所为的始末，从而生动地刻划了一个由不谙事故，只贪图享乐的贵公子，逐渐锻炼成长为一个有胆识、有作为、有度量的人物形象。其性格特征，还是非常鲜明的。

《国语·越语上》所记《越王勾践灭吴》，基本上是以越王勾践为中心进行写人记事的。吴王夫差大败越军后，越王勾践以其残兵败将五千人退居会稽。文中先写勾践用大夫文种之

谋，为保全国土，暂作缓兵之计向吴求和。次写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力求复仇。最后写时机成熟，他依靠民力，发动攻势，一举灭吴。从而写出了勾践善于听取臣下意见，依靠民力，富国强兵的远见卓识。

《战国策·齐策》所记《冯谖客孟尝君》，也是一篇以写人为主的篇章。文中先写冯谖欲做孟尝君的门客，愿寄食门下，但故作“无能”、“无好”之态，被孟尝君的左右所蔑视。次写他为孟尝君收债而自告奋勇，毛遂自荐，以及收债的经过。复次写他设计使孟尝君恢复并巩固政治地位。最后总写他为孟尝君所作出的贡献。行文自始至终都围绕冯谖这个人物使用笔墨，通过他为孟尝君开凿“三窟”的生动叙写，热烈讴歌了冯谖的政治见识和才能，从而反映了“士”人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行文以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情趣盎然，颇有吸引力。

从整体来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史书，虽不是纪传体的史书，但从上面所举以写人为主的篇章来看，已初具后来以写人为主的人物传记的基本特征。由此可见，司马迁创始的纪传，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先秦记言记事历史著作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在继承和发展中，显示了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匠心独运的天才。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一部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沿用了《史记》的体例和规模，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宋郑樵在《通志》里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明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传》类序里说：“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制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里说：“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史记》以下的史书，虽然沿袭了《史记》的体制，但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能与《史记》媲美的传记，却委实不多。所以本书只能着

重谈谈《史记》中的传记，附带谈谈《前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传记。《三国志》以下史书中的传记，既然可称道者不多，也就置而不论了。

史传以外的通行传记，包括别传和自传。别传作为一种文体的出现，始于唐代。其中以韩愈的《圜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童区寄传》最为著称。唐代以降，文人士大夫写的别传逐渐多起来，并出现了许多可资称道的名篇佳作。如宋王禹偁的《唐河店姬传》、明宋濂的《王冕传》、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清侯方域的《马伶传》、邵长蘅的《阎典史传》、近人梁启超的《谭嗣同传》等，都是久经传诵的名篇。这些传记，堪与前四史中优秀的史传媲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记在立传对象上有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所写对象不再是帝王将相、达官显宦，而转向了社会下层人物，诸如工匠、农夫、牧童、老姬、艺人等等，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的诸种品德和卓异行为。写作对象的转变，显示了作者的进步历史观和作品的进步意义。

在通行传记中，除别传外，还有自传。所谓自传，就是作者自叙生平事迹的传记。我国最早的自传，要算屈原自叙生平事迹的《离骚》。但它是诗而不是文，故于此置之不论。以文为自传的篇章，首推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继司马迁之后，历代名家多有所作，如东汉王充《论衡》中的《自纪》、魏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曹丕《典论》中的《自叙》、唐刘知几《史通》中的《自叙》、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宋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等，都是自传的名篇。

自传既然是自叙生平事迹的传记，一般说来应采用第一人称自叙其事，但在古代却不尽如此，也有别出心裁地另辟蹊径，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来写自传的，诸如晋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唐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宋郑思肖的《一是居士传》、清邵长蘅的《青门老圃传》等，都是情文并茂，一脉

相承的佳作。如果说用第一人称写自传显得真实亲切，那么用第三人称写自传，还便于客观地对自我作出评价。不管用第一人称写自传或用第三人称写自传，比之史传和别传，明显地看出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作者的个性特征。诸如王充《自纪》篇中表现出的沉默寡言，锋芒不露的深沉性格，唯物求实的作风，反传统的叛逆精神；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现的胸怀坦荡，雄豪洒脱，一代雄主的气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表现的刚直不阿，不慕荣利，忘怀得失，对现实消极反抗的心境；郑思肖《一是居士传》中表现的敌视元朝统治，“从一而终”，誓于宋朝共存亡的高度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等等，都异常鲜明地呈现出来。二是在叙述生平事迹的同时，往往述说遭际、理想和抱负，从而抒发对人生和社会的感慨。感情真挚，情深意长。

在传记中，还有带有传记性质的行状、碑志、谥文一类的文章。行状，或简称“状”。姚鼐《古文辞类纂》有“传状”类，就兼包通行传记和行状在内。只是姚氏不录史传之文，是他的偏颇和不足。所谓行状，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篇里解释说：“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这里除说明行状要实事求是地、原原本本地把一个人的德行面貌写出来的基本要求和特点外，还说明一些有名望的人死后，为死者写行状，以便向朝廷请求谥号之用。仅就用途来说，这还只是对最初的行状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的发展，行状却不仅限于为先贤表谥，而另有为铭志和史官写史传提供素材的用项。行状既然是为表谥、碑志、史传提供素材而写，带有原始资料的性质，因而一般篇幅较长，写得也较详尽全面，诸如姓氏、世系、爵里、官阶、生平事迹等都要作以介绍。行状虽然带有原始资料的性质，但也决不是资料的随意堆砌罗列，作者往往都是经过切磋琢磨，精心结构，严加取舍之功的。因而写得好的行状，实际上就是一篇

优秀的人物传记。诸如韩愈的《赠太傅董公行状》、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就是行状中脍炙人口的名篇。

行状中还包括行略、事略、轶事等名篇的文章。顾名思义，它要比行状简略，并不全面记述人物的生平事迹，而只记具有典型性的事迹，或主要逸闻轶事。虽然如此，它也是人物传记。行略，如刘大櫟的《章大家行略》；事略，如归有光的《先妣事略》；轶事，如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等，都是较著名的篇章。

上面谈到行状的用途之一，是为铭志提供素材。铭志，包括碑志和墓志。这样说来碑志中的某些以记人为主的诸如庙碑文，记述死者生平事迹的墓志和墓志铭，也具有传记的性质。写得好的，实际上也就是传记。庙碑文，如韩愈的《柳州罗池庙碑》，是为柳宗元的罗池庙写的碑文。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是为韩愈的祠庙写的碑文。象这些庙碑文，都满腔热情地称颂了死者的业绩，由衷地同情他们生前的不幸遭遇，充满敬仰和同情的浓郁感情色彩。墓碑文，在碑志文中所占比重最大，写得好的名篇也最多，诸如蔡邕的《郭有道碑》、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欧阳修的《尹师鲁墓志铭》、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张溥的《五人墓碑记》等，都写得简括扼要，事迹突出，生动感人。

诔文，是累列死者生前生平事迹的文章。它的产生，比碑志为早。刘勰在《诔碑》篇里说：“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但在西周时期有“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约束。到了春秋时期，冲破了这一桎梏，始及于士。然就现存比较完整的诔文，如《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哀公诔孔子，《列女传》所载柳下惠妻诔柳下惠来看，都很简单，还不能称其为传记。到了汉代傅毅的《明帝诔》、崔瑗的《和帝诔》等诔文的问世，才初具传记文的特征。所以刘勰称其“辨繁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诔文相

继有作，诸如曹植、潘岳、颜延之、谢庄等，都写有诔文。其中以曹植的《王仲宣诔》，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写得尤为出色，内容充实，事迹突出，感情深厚，与传记无大差别。

上述史传、别传、自传以及行状、碑志、诔文等文章，虽则名目各不相同，但从文章的内容上来看，都可以以传记括之。既然是传记，其共同要求是人物、事迹，乃至时间、地点、环境的绝对真实，决不允许虚构。这既是传记本身所要求，也是写传记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正直的、态度审慎的作家，一般都是严格按照这一原则从事写作的。但也应看到，除了写真人真事的传记之外，在古代还有另一类以传为名，并非写真人真事的作品。这类作品，大抵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人真事假的作品，如《穆天子传》、《汉武帝内传》等，只是根据历史的点滴影子，虚构为文，敷衍成篇，应属小小小说的范畴。二是人事俱假的作品，如唐传奇，则纯属文学创作，亦属小说的范畴。三是虚构人物借以讽世的作品，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即属此类。四是离开了人，用拟人化的手法去写物的作品，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螭传》、马中锡的《中山狼传》、侯方域的《蹇千里传》等，即属此类。这类作品，实际上是寓言故事，写作目的也在于借以讽世。总而言之，这四种非真人真事的作品，都是文学创作，不能与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混为一谈，这是必须严格加以分辨的。

抛开以传为名，实非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不论，仅从写真人真事的传记来看，内容是丰富多采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宝库，为之增光添彩，是很值得引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尤其对新闻工作者、对文科大专院校攻读新闻专业、文秘专业的同志了解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历史，研究其写作规律，从中汲取有益的滋养，对写作传记之类的文章，将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章 司马迁及其传记文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著作

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宦之家。其先祖为周太史。其父司马谈学识广博，精通天文、易理，对古代历史和学术思想也颇有研究，著有《论六家要旨》，论述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主导思想及其优劣得失，见解独到，具有分析批判能力。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曾任太史令，掌管图书、天文、历法和祭祀等事。司马迁十岁前，随父家居，以“耕牧”为生。后来随父到京师长安，受学于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等人，学识益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二十岁时，开始漫游。他说：“二十而南游江、淮（在今江苏、安徽一带），上会稽，探禹穴（在今浙江绍兴一带），阙九疑（在今湖南宁远县），浮于沅、湘（在今湖南省境）。北涉汶、泗（在今山东省境），讲业齐、鲁之都（在今山东临淄县和曲阜县），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在今山东省邹县和山东省东南之峄山），厄困鄆、薛（在今山东省滕县和薛城）、彭城（在今山东省铜山县），过梁、楚（在今河南和湖北）以归。”（《太史公自序》）这次他游历长江中下游和黄河沿岸各地，回到长安后，任为郎中（皇帝的近侍之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开始了政治生活。后来，或因奉使出外，或因从汉武帝封禅，或因探访史蹟进行调查研究，又到过很多地方。详见《太史公自序》、《五帝本纪》、《封禅书》等篇。郑鹤声在《司马迁年谱》里

总结他游历的情况时说：“按迁生平所游，车辙马迹，范围甚广，据《五帝本纪》所云四至为：东——海；南——江、淮；西——空峒；北——涿鹿。此盖为壮年游迹，其实尚不止此。东至冀、鲁、江、浙沿海一带，南至湘、赣、黔、滇一带，西至甘、陕、西康一带，北至河北、朔方诸地，中国本部，所历殆遍，惟未及两粤耳。其四界如次：东——经历会稽、禹穴、泰山、琅玕、东海等地；南——经历江、淮、庐山、沅、湘、长沙、九嶷、邛、笮、昆明等地；西——经历空峒、岷山、离碓、巴、蜀以南等地；北——经历龙门、朔方、长城、涿鹿等地。”游踪所至，几遍全国。他在多次游历中，饱览了祖国名山大川，凭吊了各地名胜古迹，考察了四方的风俗人情，走访了野老遗民，了解了许多逸闻轶事，广泛接触了社会生活。在丰富多采的社会实践里，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这对他政治观、历史观和文学观的形成，是深有影响的。对他后来完成伟大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史记》，也是有极大帮助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原想写一部体系完整的史书，可是他只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病死洛阳。他临死时把未竟的事业交给了司马迁。他拉着司马迁的手哭泣着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他父亲对他的谆谆遗嘱，对他决心继承父志，完成《史记》大业，是一个莫大鼓舞、鞭策和动力。

司马谈死后三年，即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果然继父职做了太史令，为著书立说，提供了方便条件。于是他有机会博览皇家大量藏书，搜集、整理资料，开始

了写《史记》的准备工作。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四十二岁时，便着手写《史记》。又过了五年，到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败降匈奴。因他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以为他有意诋毁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为李陵开脱罪责，于是被捕下狱，处以宫刑。这时，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圜圜之中，谁可告愬者。”(《报任少卿书》)他无辜受刑，不仅肉体上遭到极大摧残，精神上受到极大痛苦，人格上也受到了奇耻大辱。他多次想“引决自裁”，一死了之。但他又想到先贤们都能在苦难的境遇中奋发有为，著书立说，对他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他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他从先贤那里得到了力量，受到了鼓舞，所以决心隐忍苟活下来。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圜墙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为完成《史记》的编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顽强地战斗着。

汉武帝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他被赦出狱，做了汉武帝的中书令(在朝廷辅助尚书掌管重要文件，相当于皇帝的秘书)。中书令位虽比太史令高，但仍属无足轻重的贱职，不免受到戏弄，使他悲愤不已。他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报任少卿书》)他“身为闺阁之臣”，处于卑贱地位，是非常悲愤痛心的。因而只有“从俗浮沉，与时俯仰”，表现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但他并不消极颓废，而是以坚韧不

拔的毅力继续从事着编著《史记》的工作，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他五十五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史记》的编著。此后，他的事迹就不详了。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赋八篇”。现存只有保留在《艺文类聚》三十，被《续古文苑》收入的《悲士不遇赋》一篇。《汉书·司马迁传》和《文选》卷四十一收入的《报任少卿书》一篇。赋、书略而不论，这里只谈《史记》。

《史记》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伟大历史著作。流传至今《史记》以前的历史著作，诸如以文告的形式出现的政治史《尚书》，以年代为次进行记事的编年史《春秋》、《左传》，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国语》、《战国策》等，都缺乏完整性和统一性。《史记》则是在古代史书的基础上，参考了大量历史文献，创造性地沟通了有史以来到汉武帝为止上下几千年历史的全过程，展现了中国古代史的全貌，创发了贯通古今的通史体的新体制。《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一百三十卷（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编年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历代帝王大事记的；表，是以表格的形式把“竝时异世，年差不明”的事迹，历代传递相及的世系、列国的交往、主要官职的更迭等排列出来；书，是记载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风俗等各种类型事迹的；世家，是记载从春秋、战国到汉初侯国王侯将相兴衰存亡事迹的；列传，是记载可资传世的一般人物传记。司马迁创立的这五种体制，虽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但彼此又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统一体，可互为参照和补充。这既保持了众多错综复杂事件的完整性，也保持了众多层出不穷人物的完整性。倘若作者不是对“上下数千年间”众多事件和人物了如指掌，并条贯在胸中，倘若不是思路敏捷，构思巧妙，是不可能写得如此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素的。早在二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创立了这五种体制，不仅在中国历史著作中前无古人，就是在同时代世界历史著作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值得称道和引为自豪的。但问题不仅仅是创立了这五种体制，而更关键的则在于很好地运用了这五种体制，且在运用中体现了他与众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进步历史观。

第二节 司马迁的历史观

司马迁写作《史记》，继承了孔子的历史观。他对孔子推崇备至，仰慕已极。在《孔子世家赞》里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迴（一作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对他的为人、思想、见解给予崇高评价。在《太史公自序》里他又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自哀公十六年孔子卒至汉元封元年，实为三百七十年，而云五百岁者，取其整数），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遵照先父的谆谆嘱托，以孔子作《春秋》自许，决心完成《史记》的著述，大有所当然，当仁不让的气概。他继承孔子作《春秋》的哪些观点呢？概括说来不外两点。一是征实精神。孔子作《春秋》，征辑史实这一点，还是非常可信的。《春秋》虽以鲁国纪元，却记载了当时各诸侯国的事，诸如各国兴亡、战争、会盟、天子政权的下移、诸侯国内部的斗争，以及天灾、人祸等等，无不作了如实的记载。所记虽然简单，但简而不陋，据事而书，确凿可靠。可称是一部信史。司马迁的

《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正是继承了《春秋》的征实精神。二是劝惩，即劝善惩恶的作用。这是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所以有人说《春秋》“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这也被司马迁所继承。但在继承中，却有了长足发展。大抵说来，司马迁的历史观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强调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也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变《春秋》的编年纪事体为纪传体，这是一个伟大创举，对以写人为中心提供了方便条件。其次，在写人中他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过分夸大了他们的作用，对许多历史现象作了唯心的解释，但由于他的家庭出身不同于当时的大官僚贵族，任太史令也属于无足轻重的贱职，加之他漫游各地进行实地考察访问，使他接触了下层社会，对各阶层的人物和人民的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而且他所处的时代距秦末农民大起义为时不远，农民大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对他也有所影响，特别是他遭到宫刑之后，对汉武帝和荼毒人民的酷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深切感受，这促使他不同于一般史学家，也不同于一般士大夫文人，使他思想中有了许多进步因素。因而《史记》在写人物方面，除写帝王将相、官吏贵族、皇亲国戚而外，还写有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有农民、商人、隐士、妇女、倡优、刺客、游侠、屠夫、卖浆者以及医方、卜筮、星相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以及其他方面对社会有所贡献，起过作用的人，都为他们立传。而且在为他们立传中，渗透着鲜明的褒贬态度。其所褒贬，今天看来大都还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这点，下面还将详述，这里就略而不论了。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写人当中，不以成败论人。他在《刺客列传》里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种